

# 中国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地理因素分析 ——论西安、南京、河州之于明清中国伊斯兰教 复兴运动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0)03-0061-07

●杨志娟

[摘要] 明末清初,面临信仰危机的回族分别以西安、南京、河州为中心掀起了一场伊斯兰教复兴运动,虽然三地运动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但经堂教育的倡兴、汉文译著的展开、教派门宦的形成都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复兴伊斯兰教。本文试从人文环境、地理环境等方面探讨三场运动源起于西安、南京和河州的原因。

[关键词] 西安 南京 河州 伊斯兰教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15、16 世纪,回回民族作为中国的一个民族已形成。纵观回族历史,15、16 世纪前,来源于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们以独特的方式认同、聚合,形成一个民族。从 15、16 世纪起,刚刚形成的这一民族就开始了它为生存而奋斗的历程。明朝中后期,刚刚形成的回回民族已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甚至民族存亡危机,来自中亚、西亚的穆斯林基本停止输入,作为母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等语言也渐被汉语所取代。一般穆斯林家庭也只知道是教中人,对教义不甚了解,甚至常有歪曲、误解之事,许多地方穆斯林生活习俗汉化倾向明显,伊斯兰教陷入全面危机,急需挽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经堂教育、汉文译著、门宦教派相继兴起,这三场运动恰是当时回回中的精英分子为挽救中国伊斯兰教而启动。三场运动分别以西安、南京、河州为中心或发源地,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紧密的联系。三场运动都是由具体的回族精英掀起的,但都与当地穆斯林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伊斯兰文化氛围及当地人文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一、西安之于经堂教育的倡兴

西安在中国回族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是回族历史最为悠久的居留地之一。这不仅因为西安在唐代

阿拉伯人、波斯人大量进入中国时是国朝首都,是贡使、商人、游人、学者居住的首选之地,而且因为西安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大都市,尤其是欧亚陆路交通、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唐宋时代,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留居西安,“胡店”、“波斯肆”的记载不绝于史。元朝以后,西安的政治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随着蒙古军队与西夏战事的平息,作为“探马赤军”的大批中亚、西亚穆斯林就地入社,成为中国真正的编民。西北是当时蒙古军主要的居留地,而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地区是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的中心,这里汉文化相对发达,文化底蕴深厚,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很早就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元朝忽必烈时期,曾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安西王封地,西安成为安西王统治中心,后来阿难答成为安西王,仍以西安为统治中心。关于阿难答是否改信伊斯兰教,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不管阿难答是否改宗,至少其时蒙古军中就有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

在明初已基本形成的中国回族中,陕西回族的形成是具有标志意义的。明朝时期,陕西汉文化的发达程度虽不及东部地区,但整个人文环境都有利于教育的发展,穆斯林居留并融入其间生活是必然的事。明朝中后期,陕西回族以关中平原分布最为集中。西安城内“专门设置了伊斯兰教居民居住区,敕修了几座清真寺,于是伊斯兰教在原蒙古西域军队的后裔中迅速传播开来。”<sup>①</sup>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当地大量汉人、蒙古人与穆斯林通婚,穆斯林人口迅速壮大。这样的情况不止在西安,整个关中平原情况大概如此。回族的广泛分布,致使至清朝中期关中有“八百寺坊”之称,<sup>②</sup>这些寺坊主要集中在渭河两岸以及渭河支流的下游地区。这恰恰是从元代开始,蒙古驻军大多在未开垦的河滩水洼、草地上驻军从事屯田或随地入社进行垦荒的结果。

关中平原是西北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定居于此的穆斯林大多从事农业生产,将河洼、草滩开垦成农田。回回民族大多改变了传统的经营方式而融入中华农耕文化中,除农业种植外,各城关附近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是回族经营的主要项目,如西安“四大城关是城市的蔬菜的生产、供应基地,而回民占有三关”。<sup>③</sup>养殖业和商业也是关中回族从事的主要行业或副业,但从业人员与农业人口相比要少得多,大多是兼业。商业活动多以小商小贩、食品加工和长途贩运为多。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关中平原的回族经济发展较同时期甘肃回族要好得多。“从明代到清初,西安地区回汉杂居,有的是村落相邻、街巷相通,有的是汉回杂居。”<sup>④</sup>

关中平原回族的广泛分布以及经济活动给寺坊发展经堂教育创造了条件。经历几百年的发展,富裕的经济条件为这里伊斯兰文化的兴盛打下基础,至明中期,陕西穆斯林普遍使用了汉语,与当地汉族大量通婚,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生活习俗以及共同心理促使了他们之间的认同。但由于经师的匮乏以及对教义的疏离,伊斯兰教的信仰仍有衰落之势,自唐以来,“虽有经籍传入兹土,而其理艺难传,旨义难悉,故世代无一二精通教理之掌故,以致多人沦落迷途,漫漫长夜而甘醉梦之不觉也。”<sup>⑤</sup>所以“教义不彰,经文匮乏”是关中寺坊乃至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生活安定之时,这里的穆斯林对精神信仰的渴望成为必然。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条件具备,求经学教就会得到广大穆斯林的积极响应。

经堂教育的倡兴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出来的关中穆斯林的杰出代表。正是胡登洲以及他周围学经的人顺应了广大穆斯林的心理需求,倡导了一场历史性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变革。

胡登洲(1522~1597)系陕西咸阳渭城人。据清代赵灿所著《经学系传谱》中的记载,他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家庭,自幼聪敏过人,曾习儒业,及长随同乡高师祖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对伊斯兰学问很有兴趣。成年后,

① 王宗维.清代中叶前西安地区回民的分布与经济生活[A].西北师大西北历史研究室编.西北历史研究[C].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② 马士年.伊斯兰教在陕西的传播发展与演变[A].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

③ 王宗维.清代中叶前西安地区回民的分布与经济生活[A].西北师大西北历史研究室编.西北历史研究[C].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④ 王宗维.清代中叶前西安地区回民的分布与经济生活[A].西北师大西北历史研究室编.西北历史研究[C].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

⑤ 舍蕴善.经学系传谱[M].(内部)



外出经商,来往于陕西、西域、京城等地,丰富的阅历对他后来的人生大有裨益。有一次,他置货北上时途经临潼,与来自阿拉伯的一位朝贡者相遇。因自小习经,懂得阿拉伯语,遂与之问候,向其求教经义中不懂之处。朝贡长者十分欣喜,一一作答,甚至“联骑抵渭南旅社,剪烛共语”。嗣后二人又在京师重逢,胡登洲仍不厌其烦地求教于长者。长者朝贡完毕返回时,先生仍追随左右,一直送达甘肃,西出嘉峪关。

这次特殊的经历更坚定了胡登洲学经卫教的志向。及至学有所成之时,他即在家中设帐讲学,闻听消息后前来学经者遂络绎不绝。“授徒约百人”<sup>①</sup>,亲传弟子冯、海二先生,再传冯伯庵、冯少川、冯晓泉、冯养浩、张少川、马明龙、张行四、马真吾、马君实、常蕴华、李延龄、袁盛之等 27 人,<sup>②</sup>于是“关中八百里秦川成为经堂教育中心,群英荟萃,人才济济,继薪传,旋歌不绝。”<sup>③</sup>

今天看来,经堂教育的倡兴离不开胡登洲等人的倡导,但经堂教育本身能在西安生根开花,与这里特殊的人文和地理环境密不可分。西安地处中西交通要道,这里的回回民族广泛参与南来北往的商业贸易,并有机会直接接触西来文明,这对于当时伊斯兰教文化素养已显匮乏的回回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兴起于西安的经堂教育能以如此之快的速度传播开来,在全国回族寺坊结果,形成声气相通、各地紧密联系的特征,是刚刚形成的回族穆斯林们共同的愿望。

## 二、南京之于汉文译著的开展

如果说明末经堂教育的迅速传播拉开了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序幕,那么紧随其后的,兴起于南京的另一场运动则将这次运动推向更高的层面,这场运动紧随经堂教育之后是历史的必然。但汉文译著以南京为中心展开又与当时南京的回族发展状况及人文环境有极大的关系。

南京作为唐宋以来沿海路东来穆斯林落籍中国的东部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从 1368 到 1420 年间一直是明朝首都。明初洪武年间,南京回回人口就达到一个高峰期,大约有十万人口,占南京总人口的 14.3%。<sup>④</sup>永乐年间(1402~1420)是南京回回人口顶峰时期。其时,郑和七下西洋,到达西亚和非洲,其舰队从南京出发,官兵和水手中有不少回回人,船队也从西亚、东南亚带回不少穆斯林。以后在 15 世纪中叶至 16 世纪中叶,南京回回人口一直保持二万三的规模。<sup>⑤</sup>在清乾隆年间,形成四十多个回坊。<sup>⑥</sup>之后,南京回回除少数定居外,绝大多数被遣送云贵、湖南、甘肃临洮、青海化隆等地,南京回回人口随之大减,但居留下来的回回人口文化素质很高,有许多形成金陵回回世家。

南京的回族在清以前的职业有很大的特色。因为是国朝首都,大批的回族官员及科技文化人才云集南京,他们或从西亚、中亚等地迁来,或从中国其他地区如北京南迁,尤其是明初洪武、永乐两朝,为了充实金陵的科技文化水平,曾广召中国其他地区包括西域的学者来到金陵,一时回回学者纷纷应召而来,汇集京师,从事天文、历法、文字翻译等工作。明庭曾在翰林学院设四夷馆,礼部下设会同馆,这两馆都专门设立“回回文字馆”,专事编译、教习和翻译。明初四译馆回回文字斋既是译书,又是教学的双重机构,培养了许多回回语言文字人才,如永乐十年(1412)一次卒业的回回文字监生达 120 人。<sup>⑦</sup>这些语言文字学者大多世代相袭,后来形成许多回回语言文字世家,有深厚的波斯语、阿拉伯语功底。

据《明史·历法志》记载,洪武元年置回回司天监,诏征元太史院张祚、回回司天监黑的儿等 14 人来京。

① (清)赵灿.经学系传谱[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

②③ 纳国昌.经学先河,源远流长[A].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编.伊斯兰文化研究[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④ 伍贻业.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M].南京: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内部),2000.40.

⑤ 伍贻业.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M].南京: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内部),2000.42.

⑥ 伍贻业.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M].南京: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内部),2000.66.

⑦ 伍贻业.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M].南京: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内部),2000.116.

“洪武十五年秋命钦天监灵台郎海达尔、阿达兀丁、回回大师马沙亦赫、马哈麻等译《回回历法》,洪武廿四年命西域归附、识天文奥妙者参与研铸浑天仪,置回回钦天监观象台于聚宝山东麓。此时期,在南京的回回人有很大一部分在军政、科教领域供职,仅有资料可考者,明初驻南京回回军官据统计有24人,应征到南京的回回学者据不完全统计有13人。”<sup>①</sup>这批人是当时中国回回中素质较高的。在永乐年间京师北迁时,他们中部分人随行北迁,还有一部分仍留在南京。随着明中叶以后国势的衰落,对外交流越来越少,中国回族与中亚、西亚等地的来往越来越少,而回族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南京回回许多转而经商,经营手工等业,形成许多回回世家。史载,明代南京重要的回回世家有近二十家,“如文化方面出现了金贤、金大车、金大舆父子三文豪,商业方面出现了由钦天监改业经营毡货的缙绅伍浩,还有因恤赈受赐四品冠带,礼部‘儒士’衔的回族商人。”<sup>②</sup>原供职于回回文字馆的回回文字监生也失去了政府部门的职业,留在南京者“多数则成了清真寺的伊玛目、经师、阿訇。有些条件优越,自幼又学习过儒学的则成为兼通儒理的回回学者。”<sup>③</sup>这些回族大世家以及其他南京回回,在中国居住的长时间中,渐与汉文化相融合,许多人开始学习汉文化,兼具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两种养分,他们的后裔也大多从事科技或攻儒业进军科举。这不能不为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中南京形成成为中心之一打下丰厚的文化基础。

所以,从元明以来,尤其是明代开国五十多年,南京成为南方重要的大都市,在回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京师,它在培育回回民族文化和其与汉文化交融、借鉴中有着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回回学者必然在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尤其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运动中担当重任。西安经堂教育倡兴以来,南京回族积极响应,纷纷前往求学,并聘请胡登洲三位弟子,有名的经师张少山、马真吾等到南京净觉寺、旱西门、卢妃墓诸教坊开学讲经。在他们的培养下,南京成长了一批有名的经师,马君实、马之骥、袁盛之、马进益等成为胡登洲的四传弟子。而后来致力于以儒诠经的南京著名回族学者王岱舆、伍遵契、袁懋昭、张中、刘智等人,他们经汉两通,他们无一不出身南京回回世家名门。家学渊源以及经堂教育使他们具有深厚的伊斯兰经学功底,浓郁的汉文化氛围也使他们对儒学甚至道家、佛学都有深入的研究,有的人还曾取得科举功名。比如王岱舆,系明初被召入京的回回钦天监的历城人后代,青年时代师从马君实,不仅伊斯兰经学功底深厚,且对儒、道、佛学都有研究。比如张中,他曾是著名经师张少山的弟子,又曾拜师印度学者阿世格,经汉皆通。比如伍遵契,系明初回回钦天监伍儒的九世孙。比如明清之际汉文译著运动的集大成者刘智,出身教门世家,年少即从儒师读经史子集,既长钻研伊斯兰经籍,一生博览群书,才会在变通儒学和伊斯兰教方面有如此高的作为。

如此来看,只有明朝直至清初的南京那样具有培育回回精英人物的伊斯兰和儒学双重文化土壤,才能孕育出明清之际以儒诠经的丰硕成果,才能历史性地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哲学的领域内贯通起来。

### 三、河州之于门宦教派的形成

河州被称为中国的“小麦加”,得益于它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独特地位。直到今天,河州不仅是中国伊斯兰教文化氛围最浓厚的地区之一,也是门宦教派发展最为繁杂的地区。

明末清初,当西安成为经堂教育的中心,南京成为汉文译著的中心时,河州成为另一个伊斯兰文化的中心,掀起了继经堂教育、汉文译著之后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又一次高潮,门宦教派由此兴起。清朝乃至民国时期,先后在西北地区形成不同的门宦派别,如虎夫耶、哲合林耶、嘎的林耶和库布林耶等较大门宦,各门宦又因各种原因形成不同的小门宦。在清后期到民国年间,西北甘宁青地区最终形成的门宦多达四十多支,其中大多数门宦兴起于河州。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河州地区乃至回族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

① 伍贻业.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M].南京: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内部),2000.91~96.

② 伍贻业.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M].南京: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内部),2000.42.

③ 伍贻业.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M].南京: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内部),2000.117.





一方面 明末清初 回族经堂教育已初具规模 随着经堂教育在西北的普及 宗教职业者的规模越来越大 以清真寺为中心研究伊斯兰教学术的风气逐渐形成 这为清朝康熙年间中国海禁取消后 西北各地掀起的穆斯林朝觐热潮奠定了基础。这次朝觐热潮是继明初西域回回入附中原之后中外伊斯兰文化交流的又一次黄金时期 为甘青地区接受经堂教育后渴望继续求学的穆斯林提供了良机。他们或西行至西域、中亚 或南行经印度等地转折到阿拉伯。从中亚、西亚接受了苏菲派学理的朝觐者回国后有部分人走上传经、讲教的道路 为创立不同的苏菲门宦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 明末清初回族遍天下的局面已经形成 而且陕西和甘肃的回回人口最为集中。甘肃地区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接地带 河州地区回回人口更为集中。河州地区在唐中叶以后一直是吐蕃的活动地区 直到明朝中后期 俺答汗率和硕特蒙古进驻青海 河州成为蒙古族和藏族争夺的地区 该地藏族在反复的较量中逐渐西移、南迁。清初 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平定后 河州蒙、藏势力被进一步削弱 给这里的回族以发展的空间。康熙《河州志》记载 河州原居住的藏族加砸、尕工、铁巴、川藏等 36 部落 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时全部迁移他处 并移入回、东乡、撒拉、保安等族居民。此时 河州“城内有回民 8 坊 清真寺 12 座 相邻的狄道(临洮)、洮州(临潭)、岷州(岷县)也都是伊斯兰教文化兴盛之地。”<sup>①</sup>再加上“河湟地区的汉文化经唐、宋以来吐蕃几百年的打击 已相当脆弱 明清时汉文化的回归又姗姗来迟”<sup>②</sup>在这个汉文化和藏文化都比较薄弱的间隙中 伊斯兰文化迅速成长。经堂教育倡兴以后 伊斯兰文化发展更为迅猛 所以尽管河州在中国伊斯兰文化上地位的兴起在西安之后 但一旦兴起 就以其独特的优势取代西安 成为西北经堂教育的中心。

汉文化的相对薄弱也使河湟地区社会基层的管理模式不同于内地汉族地区。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由行政机构和政府官员构成的显性国家权力并没有进入乡村社会”<sup>③</sup> 县制之下的乡村控制是通过乡村权威的直接干预。具有知识和经济资本的士绅或家族中的族长往往是乡村权威的重要来源,他们享有各种资源 凭借其权势操纵公众舆论 指导和管理社区 成为官吏和农民之间的中介。这种统治格局是中国农业社会不可或缺的历史方式。但是在汉文化欠发达、回族人口比例很高的牧业经济边缘地带 比如河湟地区 已发展出一个个寺坊的回族乡间社区 士绅在民间社会的地位和角色往往由回族有阿林的人即宗教职业者担当 因为特殊的生活习惯和信仰 他们不仅仅是穆斯林精神信仰的导师 也是世俗生活的指导者 中国的行政管理方式给予他们与汉族社会士绅、族长一样的权利空间 调解纠纷、从教法方面解释穆斯林行为合法与否 甚至部分包揽词讼 使他们担当了社会基层的管理者。这是门宦等级制度得以建立和充分发挥社区管理功能的基础之一。清朝中叶 曾因教派纷争 清政府明令“不准再立掌教名目” 而代之以行政上的“乡约”统治 但事实并未改观。由此可见 在西北回族聚居区 民间宗教势力在乡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门宦制度得以建立的重要条件。正是在清初河州所处的这种文化背景下 苏菲主义在这里落地生根 而且形成众多的门宦。门宦制度本身也可视为伊斯兰文明与汉族封建制度结合的特例。

在河州所具有的优势中 回族在商业经济上所形成的特色也是门宦教派形成和运转的必备条件。这里的回族充分利用农业和牧业经济之间的互补需求东走西进,活跃于青藏高原和内地之间,甚至中亚和中国之间 积聚了财富 同时沟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经商以及长途运输使他们见多识广 中亚、西亚文明在河州能够广为传播 至少在明末清初 河州地区以经商而闻名的伊斯兰地域文化已经形成。清代各种地方文献中关于河州的记载无不着重提及这里穆斯林经商的繁荣以及居民的富庶 《甘宁青史略》中的描述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八方为回民商务聚集之地 富甲省垣 居民三万余人 全等回族。”这样的经济地位无疑对于河州社会地位的抬升是有益的 也为伊斯兰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清朝以来 随着河州在中国伊斯兰教中地位的升高 许多穆斯林慕名而来 或为学经 或举家搬迁而来 中国各地回族精英云集河州。

门宦在甘青能发展形成多达四十多支 与苏菲教团在其地迅速走向世俗化也有密切的关系。甘青地理环

① 赵珍.清代黄河上游地区民族格局演变浅探[J].青海民族研究,19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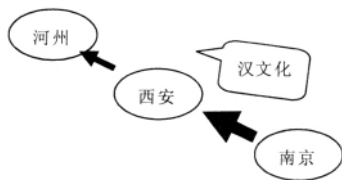
② 武沐、王希隆.论清代河州的再度兴起[J].回族研究,2001,(2).

③ 徐勇.序言[A]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境封闭,这里山岭纵横,自然条件极差,自然灾害频繁,经济落后,虽然河州有很多富家大户,但河湟地区大多数农民生活贫困,所以在精神需求上表现为对清贫乐道的苏菲的积极追随。产生于清朝甘青地区的几十支门宦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各成系统的宗教组织,每个宗教组织都拥有一位个人魅力型领袖,宣称个人在体验真主的道路上有独特的经验,能够提供给教徒全新的生活方式,并能引导教众到达彼岸世界,实现宗教信仰的精神目标。普通信教者面对抽象的启示、灵验及原始经文时,必须有通俗化的行为方式及规范来引导他们去实践,而门宦创始人大多具有这种能引导教众通过特殊的宗教行为达到信仰的能力,这种通俗的易于被普通人所习得的体验方式自然成为门宦组织形成时期的磁石,吸引着渴望者的加入。门宦的创始人在创建门宦时不在清真寺任职,只是学成回来,在家中设帐讲学,穆民闻名前来探望听讲,遂成为徒弟,师徒之间只以宗教学理作为交流、学教的内容,传道者随之成为领导求道人追求精神解脱,体验真主独一的精神领袖。而甘青地区早已形成的阿訇权威形式在此时发生了置换,苏菲逐渐代替单一教坊下阿訇的权威,从精神领袖过渡到精神领袖加世俗领袖。随着同一个苏菲下教民的增多和教坊数量的增加,层级制自然建立起来,教坊层级管理使门宦走向组织化和制度化,门宦教权得以正常运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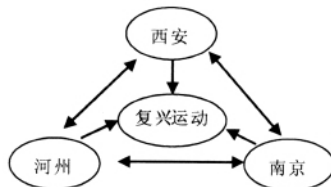
门宦更多地表现出社会组织和管理的功能,它成为对甘青郡县制在回族社会的一种补充和延伸。但在门宦创立的过程中,创始人的传教过程无疑也是一种译经、释经过程,他们依据所学和自己的体验引领求道者体会伊斯兰,体验真主。只是他们所面对的群体不同,译经、释经的目的也不同于学通四教的汉译家们,所以他们译经、释经是以适合当地的方式进行的。“从译释方式方面看,门宦对经籍的译释没有专一的形式,大抵是口头语言、动作示范、暗示提示、书面形式都有。”“从译释对象来说,门宦家面对的是从小穷困,没钱读书,在死亡线上挣扎,期盼奇迹发生的民众,因而汉文译著那种‘非为不知文者作也’的典雅形式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于是他们采用的是便于向穷人作口头传教的通俗形式,多选用歌诀、比喻、暗示、音译词语及民众熟悉的语言。”<sup>①</sup>这也是门宦家在甘青地区有如此多的追随者的原因之一。

形成中的回回民族即面临严重的文化断层问题,西安、南京、河州这三地提供了中国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舞台。而汉文译著、经堂教育、门宦教派三场运动兴起所需要的汉文化氛围依次减弱。汉文译著需要很高的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素养,经堂教育对汉文化的需求相对减弱,而门宦教派则对汉文化的需要相对更弱,才能提供其重新组织社会的基础。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三地恰恰符合这样的需求。南京地处东南沿海,又曾是明廷首都,汉文化发达,其文化、经济中心地位是回族上层精英聚居的必然条件,在这里兴起对汉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素养要求极高的汉文译著活动即显得极为自然和合理。西安处于河州和南京的中间,深处内陆,但历史名都使其文化底蕴深厚,交通便利,成为回族南来北往最为活跃的地区,为经堂教育提供了文化基础。而河州在偏远的西北汉藏文化交接地带,远离汉文化中心,回族人口最为集中,伊斯兰教氛围浓厚,尽管商业有所发展,但整体经济落后,生活贫困而缺乏社会组织,给以精神信仰为依托的世俗化宗教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所需空间,使得门宦教派的形成有了经济、文化、社会的基础。



在三场运动中,西安的经堂教育是源。经堂教育推动了南京汉文译著的开展,反过来汉文译著的成果又推动了经堂教育的发展,而门宦教派的兴起是以经堂教育以及汉文译著为背景的,反过来门宦教派的兴起也促进了经堂教育以及汉文译著向更深层次发展。三场运动无疑都推动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使伊斯兰文明和中国文明以回回民族为载体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借此拉开回回民族文化形成的大幕。

<sup>①</sup> 李兴华,《经堂教育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学理化》[A],西安市伊斯兰文化研究会编,《伊斯兰文化研究》[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经堂教育、汉文译著和门宦运动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它们构成了明清之际伊斯兰教中国化或中国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三个方向,开拓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或中国社会对话和互动的空间,表明了两种文明的互动向更深层次发展,为中国穆斯林指明了生存方向,对于回族等民族的稳固以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有着巨大的贡献。

因为有了经堂教育这个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教众之间的中介,宗教职业者得以源源不断地产生,即使是语言不通,因为有了汉文译著,中国汉族等其他民族得以了解伊斯兰教,理解儒学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互通之处,中国穆斯林得以了解中国深层的文化及其人生哲学。因为有了门宦运动,穆斯林社会以教派为中介,得以与中国传统社会有了更深的结合,尤其是教派门宦的组织化使穆斯林民间更顺应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组织管理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伊斯兰教能在中国生存下来,穆斯林民族(回、东乡、保安、撒拉)能在中国形成并巩固下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这场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适时出现。

[收稿日期]2010-04-08

[作者简介]杨志娟(1971~ ),女,回族,烟台大学民族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烟台 264005

##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ical Factors of the Chinese Islamic Renaissance Movement: the Importance of Xi'an, Nanjing and Hezhou to Chinese Islamic Renaissance Movement in Ming and Qing Periods

Yang Zhijuan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crisis of faith, Hui people started the Islamic renaissance movement centered on Xi'an, Nanjing and Hezhou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Although the movements in these three regions have different contents and forms, the initiation of Mosque educati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Islamic classics and the formation of Islamic sects were all aiming to save the whole ethnic group and revive Islam. This article probes into the reason why these movements rose up in Xi'an, Nanjing and Hezhou from the human environment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Key words:** Xi'an; Nanjing; Hezhou; Islam

(上接第 60 页)

## Analysis on the Source of the Decline of Taoism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riental and Western Religious Perspectives

Li Haimei Chen Changwen

**Abstract:** The difference in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f the oriental and western religions are originated from their opposite religious perspectives. The basic Taoist philosophy, consisting of polytheism, patriarchal dependency in its survival and the utilitarianism of religion,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aoism in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and its declines as well.

**Keyword :** Oriental & Western; religious perspectives; Taoism